



• 学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参考资料 •

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 对待革命的羣众运动

辽宁人民出版社

目 录

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对待

革命的群众运动 (1)

x x x

必須正确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 孙定国 (24)

关于工业战綫的群众运动 柯庆施 (42)

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 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

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問題，从来是馬克思主义者和反馬克思主义者爭論的根本問題之一。在社会主义建設中，这同样是一个根本問題。

为了帮助讀者了解历来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对这个問題的观点，駁斥右傾机会主义者对群众运动的污蔑，我們选录了两部分材料，一部分是毛澤东同志的論述，一部分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論述。

馬克思主义者从来非常尊重群众的革命的創造性和主动性。正如列宁所說的，馬克思“最重視的是工人階級的奋不顾身积极創造世界历史的行动”。馬克思主义者嘲笑资产階級的那种害怕群众、害怕群众运动的軟弱性和反动性。馬克思說：“资产階級当民众还是保守的时候，是不免要害怕民众愚鈍的，而在民众一旦变得革命的时候，却又要害怕民众觉悟了。”

不錯，工人階級在革命中或在建設中是會遇到某些曲折和困難的，這是前進中的曲折和困難，只要緊緊地依靠群眾，發動群眾的力量，就可能迅速地加以克服。資產階級的仆從們，譬如我們現在的右傾機會主義者，絲毫沒有這種馬克思主義的態度，絲毫沒有克服困難的信心，而且對於我們事業發展中的某些困難譏諷嘲罵。列寧說得好：“對轉變中的困難和挫折幸災樂禍，散布惊慌情緒，宣傳開倒車，——這一切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進行階級鬥爭的工具。無產階級是不會讓自己受騙的。”

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就指出了對群眾運動的三種不同的態度：“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後頭指手畫腳地批評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對面反對他們呢？”現在，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對待群眾運動，仍然有這三種不同態度的人。毛澤東同志堅決地反對把群眾運動看成“糟得很”，而熱烈地歌頌群眾運動是“好得很”。毛澤東同志所說的這個真理永遠不會過時。有的人之所以跌到右傾機會主義的泥坑裡面，他們之所以倒霉，就因為他們不願意相信這個真理。

第一部分 毛澤东同志的論述

……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問題。很短的时间內，將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驟雨，迅猛异常，無論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們將冲决一切束縛他們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將在他們面前受他們的檢驗而决定取舍。站在他們的前头領導他們呢？还是站在他們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評他們呢？还是站在他們的对面反对他們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項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將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

农民在乡里造反，攪动了紳士們的酣梦。……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滿城风雨的議論的压迫，他閉眼一想乡村的情况，也就气馁起来，沒有法子否認这“糟”字。很进步的人也只是說：“这是革命过程中应有的事，虽則是糟。”总而言之，無論什么人都无法完全否認这“糟”字。实在呢，如前所說，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們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軍閥、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內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

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16—17页）

……我们的代表大会应该号召全党提起警觉，注意每一个工作环节上的每一个同志，不要让他脱离群众。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居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的东西，广大群众也和自己一样都了解了。群众是否已经了解并且是否愿意行动起来，要到群众中去考察才会知道。如果我们这样做，就可以避免命令主义。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还不了解的东西，群众也一概不了解。许多时候，广大群众跑到我们的前头去了，迫切地需要前进一步了，我们的同志不能做广大群众的领导者，却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见，并且将这种落后分子的意见误认为广大群众的意见，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总之，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

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論联合政府”，1945年。“毛澤东选集”第

3卷，第1096—1097頁）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象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說：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地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規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針。

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針，这是錯誤的方針。

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規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偉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計劃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运动中免不了要出些偏差，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难糾正的。干部中和农民中存在的缺点或錯誤，只要我们积极地去帮助他們，就会克服或糾正。干部和农民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前进的，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在有些地方，他們在工作中犯了一些錯誤，例如：一方面排斥貧农入社，不照顧貧农的困难；另一方面又强迫富裕中农入社，侵犯他們的利益。这些都應該向他們去进行教育，加以糾正，而不是簡單地去进行斥責。簡單的斥責是不能解决問題的。要大胆指导运动，不要前怕龙，

后怕虎。干部和农民在自己的斗争經驗中将改造他們自己。要讓他們做，在做的中間得到教訓，增长才干。这样，大批的优秀人物就会产生。前怕龙后怕虎的态度不能造就干部。

.....

我們应当爱惜农民和干部的任何一点微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不应当去挫折它。我們应当同合作社社員、合作社干部和县、区、乡干部共命运，同呼吸，不要挫折他們的积极性。

.....

在胜利面前，我認为有两种不好：（1）胜利冲昏了头脑，使自己的头脑大大膨胀起来，犯出“左”的錯誤，这当然不好。（2）胜利吓昏了头脑，来一个“坚决收縮”，犯出右的錯誤，这也不好。現在的情况是属于后一种，有些同志被几十万个小型合作社吓昏了。

.....

在发展的問題上，目前不是批評冒进的問題。說現在合作社的发展“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这是不对的。

.....

这些同志看問題的方法不对。他們不去看問題的本質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強調那些非本質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应当指出：不能忽略非本質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問題，必須逐一地将它們解决。但是，不应当将这些看成为本質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

我們必須相信：（1）广大农民是願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2）党是能够領導农民走上社会主

义道路的。这两点是事物的本质和主流。如果缺乏这种信心，我们就不可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第1—

2、10、12、18、21页）

那些不相信就一个一个的地方来说可以在三年内实现初级形式的合作化的人们（三年合作化的口号是群众提出的，遭到了机会主义者的批评），那些不相信晚解放区可以和老解放区同时实现合作化的人们，请看一看江苏省崑山县的这个乡吧！这里不是三年合作化，而是两年就合作化了。这里不是老解放区，是一个千真万确的晚解放区。这个晚解放区，走到许多老解放区的前面去了。有什么办法呢？难道可以把它拉回来吗？当然不能，机会主义者只有认输一法。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这种人难道我们遇见得还少吗？这些只会循着常规走路的人们，老是对于人民的积极性估计过低。一种新事物出现，他们总是不赞成，首先反对一气。随后就是认输，做一点自我批评。第二种新事物出现，他们又按照这两种态度循环一遍。以后各种新事物出现，都按照这个格式处理。这种人老是被动，在紧要的关头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别人在他的背上击一猛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那一个年头能使这种人自己想办法走路，并且走得象个样子呢？有一个治好这种毛病的法子，就是拿出一些时间到群众中去走一走，看看群众在想些什

么，做些什么，从其中找出先进經驗，加以推广。这是一个治好右傾頑症的有效的藥方，奉劝人們不妨試一試。

（“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一文按語，1955年。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冊，第587—588頁）

几乎带普遍性地在許多地方存在着的、阻碍广大的貧农和下中农群众走合作化道路的、党內的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同社会上的資本主义势力互相呼应着。对于这样一种情形，这一篇文章算是描写得恰好。作者以极大的憤怒斥責了机会主义者，支持了貧苦农民。有些人虽然頂着共产主义者的称号，却对于現在要做的社会主义事业表現很少兴趣。他們不但不支持热情的群众，反而向群众的头上潑冷水。一九五五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决勝負的一年。这一决战，是首先經過中国共产党中央召集的五月、七月和十月三次會議表現出来的。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是那樣的烏烟瘴气，阴霾滿天。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戶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到編者写这几行的时候，全国已經有六千万以上的农户加入合作社了。这是大海的怒濤，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臉，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內也是这样。这一年过去，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有了很大的把握了。当然还有許多战斗在后方，还要努力作战。

（“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一文按語，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冊，第729—730頁）

这是一篇动人的叙述，希望讀者好好地看一遍。特別要請那些不相信广大农民群众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的同志和那些动不动就想拿起刀来“砍掉”合作社的同志好好地看一遍。現在全国农村中，社会主义因素每日每时都在增长，广大农民群众要求組織合作社，群众中涌出了大批的聪明、能干、公道、积极的領袖人物，这种情况十分令人兴奋。最大的缺点，就是在許多地方党的领导还没有主动地赶上去。目前的任务，就是要使各級地方党委在这个問題上采取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动立場，将整个农业合作化的任务拿到自己手里来，用积极的高兴的欢迎的全力以赴的态度去领导这个运动。不要重复叶公好龙那个故事，講了多少年的社会主义，临到社会主义跑来找他，他又害怕起来了。

（“一个違背领导意願由群众自动办起来的合作社”一文按語，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下冊，第1204頁）

第二部分 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論述

……誠然，资产階級当民众还是保守的时候，是不免要害怕民众愚鈍的，而在民众一旦变得革命的时候，却又要害怕民众觉悟了。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政变記”，1851年。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第313頁）

如果你讀到我底“拿破侖第三政变記”底最末一章，你就

可看見我說了这样的话：法国革命底下一次的企图，不再是象从前一样，把官僚主义的軍国主义的机器从一手移轉于它手，而是要把它打碎；这是欧洲大陆上每一真正民众革命底先决条件。我們英勇的巴黎党的同志們所企图的，就是如此。这些巴黎人，是有何等的机动能力，何等的历史的創造力，何等的自我牺牲的能力呵！經過了六个月的飢餓与破坏之后造成飢餓与破坏的，与其說是国外的敌人，不如說是国内的叛变，他們，在普魯士的刺刀下面革命起来，好象法国与德国沒有发生战争似的，好象敌人不在巴黎門前似的。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象这样偉大的例子。如果他們归于失敗，那只是由于他們底“寬容的性質”。在最先維諾衣后来巴黎国民軍底反动部分，都敗退到凡尔賽之后，他們應該立即向凡尔賽进军。由于良心上的躊躇，他們丧失了时机。他們不願发动国内战争，好象那恶毒的妖物梯亥尔还没有因企图解除巴黎武装而把内战发动起来似的。第二个錯誤：中央委员会为要讓位給公社，而把权力放弃得太早。这又是由于“太过端正”以至流于疑惧！虽是如此，这一次的巴黎起义——即使它被旧社会底狼、猪和恶狗們所压倒——还是我們党从巴黎六月起义以来的最光荣的行为。将这些巴黎底“翻天覆地”的英雄們，与德意志普魯士神圣羅馬帝国（它帶有染着兵营臭味、教堂臭味、士官貴族臭味、尤其是庸人臭味之因襲的假装）底順天的奴才們比較一下吧。

（馬克思：“致額格曼論巴黎公社的信”，1871

年。“法兰西内战”，第103—107頁）

至于我們，那末根据我們的全部过去，擺在我們面前的只

有一條路。在差不多四十年間，我們一直是最重視階級鬥爭，認為它是歷史的直接動力，特別是最重視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間的階級鬥爭，認為它是現代社會變革的強有力杠杆；所以我們決不能去和力求把這個階級鬥爭從運動中勾銷的人們一起行走。在創立國際時，我們明確地規定了一個戰鬥口號：工人階級的解放應該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所以，我們不能去和公然說什麼工人太缺少教育程度來自己解放自己，因而應當由慈善主義的大小資產者一手從上面解放出來的人們一起行走。

（馬克思和恩格斯：“致奧·倍倍爾、威·李卜克內西、威·布拉克等人”，1879年。“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2卷，第485—486頁）

革命是歷史底火車頭，——馬克思這樣說過。革命是被壓迫者與被剝削者底盛大節日。民眾在其他任何時候都不如革命時期這樣能表現為新社會制度底積極創造者。在這樣的時期，人民能夠作出從市儈漸進主義狹小眼光看來是不可思議的奇蹟。但在這樣的時候，必須使革命黨底領導者也更廣闊更大膽地提出自己的任務，必須使他們的口號始終能發揚群眾底革命自動性，成為他們的燈塔，表明出我們的民主理想和社會主義理想底全部偉大與全部光采，指明出達到絕對完全徹底勝利的最近最直的道路。……首先且讓无情的鬥爭來解決選擇道路的問題吧。如果我們不利用群眾這種異常興奮的毅力及其革命的熱情來為直接堅決道路進行无情而奮勇的鬥爭，那我們就會成為叛變和出賣革命的人了。

（列寧：“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1905年。“列寧文選”兩卷集第1卷，第654—655頁）

馬克思對公社的評價是他給庫格曼的書信中的精華。拿這種評價來和俄國社會民主黨右翼所用的手段對照一下，是特別有益處的。普列漢諾夫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事件以後，灰心喪氣地喊道：“本來是不需要動用武器的”，而他居然還把自己同馬克思相比，說馬克思在一八七〇年也曾阻止過革命。

對的，馬克思也曾阻止過革命。但請看看，普列漢諾夫所作的這種比擬，正好表明普列漢諾夫和馬克思有天淵之別。

在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即俄國革命浪潮達到頂點的一個月以前，普列漢諾夫不但沒有堅決警告過無產階級，反而公開說必須學會掌握武器，必須武裝起來。而一個月以後，當鬥爭已經爆發的時候，普列漢諾夫卻又毫不分析這次鬥爭的意義，分析這次鬥爭在整個事變進程中的作用，以及同以前鬥爭形式的聯繫，便馬上扮作悔過的知識分子說道：“本來是不需要動用武器的。”

一八七〇年九月，即在公社成立半年以前，馬克思已在有名的國際宣言中直接警告過法國工人，說實行起義是愚蠢舉動。他事前就揭露了以為一七九二年的運動可能再現的民族主義幻想。他不是事後，而是好幾個月以前就說過“不需要動用武器”。

當他自己在九月認為毫無希望的這件事情在一八七一年三月開始實現的時候，他又採取了怎樣的態度呢？馬克思是否利用這一點（好象普列漢諾夫利用十二月事變那樣）來專門“挖苦”自己的敵人，即那些領導了公社的蒲魯東派和布朗基派呢？他是否象一位女教師那樣嘮叨說，我曾經講過，我曾經警告過你們，而現在你們看，你們的浪漫舉動，你們的革命狂想，搞出了什麼名堂呢？他是否也象普列漢諾夫教訓十二月起義的戰士

那样，用什么“本来是不需要动用武器的”这类自鸣得意的庸人的說教来教訓公社活动家呢？

不。馬克思在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給庫格曼写了一封非常热情的信，我們希望每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每个識字的俄国工人都把这封信当作座右銘。

馬克思在一八七〇年九月把起义說成是愚蠢举动，但到了一八七一年四月，当他看見人民的群众运动已經起来的时候，他就以参加者的态度，对这个标志着世界历史革命运动前进一大步的偉大事变表示莫大的关切。

他当时說，这是要打破官僚軍事机器的尝试，而不是简简单单把这个机器从一手轉交到另一手。他謳歌蒲魯东派和布朗基派所領導的巴黎“英勇的”工人。他当时写道：“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第88頁）……“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

馬克思最重視的是群众的历史主动性。要是我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从馬克思身上学到怎样来估計俄国工人和农民群众在一九〇五年十月和十二月所表現的历史主动性，那該多好啊！

一面是半年前就預見到失敗的一位极深刻的思想家竭力推崇群众的历史主动性，一面是毫无生气的麻木不仁的迂腐說法：“本来是不需要动用武器的！”这岂不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嗎？

馬克思当时虽然流亡在倫敦，但他却以他特有的全部热情投入了这一群众斗争，并且作为这一斗争的参加者来評價那些“奋不顾身的”、“决心冲天的”巴黎人所采取的直接步骤。

現在俄国馬克思主义者中那些在一九〇六到一九〇七年大黑革命浪漫主义的“现实主义的”聪明才子們，在当时不知会

怎样譏笑馬克思！他們看到这位唯物主义者和經濟学家，这位烏托邦的敌人贊揚冲天的“嘗試”时，不知会怎样嘲笑他呢！那些套中人^①看到这种所謂暴动意图和烏托邦主义等等，看到对冲天的运动所做的这种估价时，不知会怎样掉泪、冷笑或表示怜悯！

而馬克思絲毫沒有象絕頂聰明的鱗魚^②那样害怕討論革命斗争最高形式的技術問題。他正是討論起义的技術問題。是防御，还是进攻呢？——他写道。当时他好象是看見軍事行动就在倫敦附近发生似的。接着他自己解答說：一定要进攻，“本来是應該立刻向凡尔賽進軍的……”

.....

馬克思警告領導者不要举行尚未成熟的起义。但他对待决心冲天的无产階級，却是以实际的顧問，以群众斗争的参加者的姿态出現的，因为不管布朗基和蒲魯东的荒謬理論和錯誤怎样，群众究竟把整个运动提到了更高的阶段。

.....

馬克思沒有向无产階級隱諱公社所犯的任何一个錯誤，他为这一偉大事业而写的一部著作，至今还是“冲天的”斗争中最好的指南，同时也是自由派和激进派的“瘟猪”最害怕的东西。

普列汉諾夫为十二月事变写的一部“著作”，却几乎成了立宪民主党人的福音书。

.....

① 套中人是契訶夫同名小說中的主人公，是因循守旧的典型。

② 絕頂聰明的鱗魚出自謝德林的諷刺故事“絕頂聰明的鱗魚”，这是諷刺那些謹小慎微、混世度日、逃避斗争的人物的。

馬克思在一八七〇年九月把起义叫做愚蠢举动。但当群众已經起义了的时候，馬克思就願意同他們一起前进，同他們一起在斗争过程中学习，而不是訓誡他們，向他們打官腔。他懂得，誰想事先絕對确切地估計胜利的机会，誰就是有意欺騙，或是迂腐到不可救藥。他最重視的是工人階級奮不顧身积极創造世界历史的行动。馬克思觀察世界历史，是从正在創造历史，但无法事先絕對准确地估計胜利机会的那些人們的观点出发的，而不是从瞎說“本来容易預察到……本来是不需要动用……”等等的庸俗知識分子的观点出发的。

同时，馬克思能够理解到历史上常有这种情形，即群众进行的殊死斗争甚至是为了一件沒有胜利希望的事业，但对于进一步教育这些群众，对于訓練这些群众去作下一次斗争却是必需的。

我們現在那些冒牌馬克思主义者喜欢濫引馬克思的話，只願仿效他估計已往而不願仿效他創造未来，他們完全不能理解，甚至根本反对这样一种問題提法。普列汉諾夫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后开始“阻止”……时，根本就沒有想到这样一种問題提法。

（列宁：“卡·馬克思致路·庫格曼书信集俄譯本序言”，1907年。“列宁全集”第12卷，第100—105頁）

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論不同，它既能以非常科学的冷靜的态度去分析客觀形势和进化的客觀进程，同时又能非常坚决地承認群众（当然，还有善于摸索到同某些階級的联系，并實現这种联系的个人、团体、組織、政党）的革命毅